

那 夜 無 星

導論

鄭宇碩

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

現代知識分子，是社會群體的一部分，不敢像范仲淹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但知識分子的特徵，應該是重視人的尊嚴；對作為社會良知的承擔，不會輕易卸責。本書的作者，希望在「天安門事件」20周年之際，表達一點心意，一點對國家民族的關懷。

紀念「六四」，一方面是求真，另一方面是對歷史負責任。中國領導人在中日官方交往中，經常提到「以史為鑑」；在雙邊關係陷於低潮時，更嚴厲批評日本迴避真相，歪曲歷史，然而在處理「六四事件」時，就一點點求真和「以史為鑑」的精神也沒有。

中國共產黨絕對無意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只是絕不容許挑戰其政權而已。現階段中國領導人維持中共政權的方程式是經濟發展加基本的社會保障網再加沒有民主的良治。迅速的經濟增長激化了新疆的動亂是最顯著的寫照。

中國領導層了解單憑經濟增長再也不足以提供政權的認受性；面對貧富越趨懸殊，政府必須提供一個起碼的社會保障網。近年政府財政充裕，有條件為全民加強必要的社會服務，因此農村的教育經費和對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支援大幅增加。

在不衝擊一黨專政的條件下，中國領導人也追求良治，這正是大談黨建、黨內民主和法治的基本原因；但其局限性亦非常明顯。打擊貪污就清楚反映這種良治的局限性。先不談民主與法治，為避免衝擊一黨專政，連主流媒體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也不能有效監察官員的貪污，這就難怪貪污泛濫了。

過去三十多年的驕人經濟成長，使一般國民不願求變，對未來改善生活仍有相當的憧憬，這其實是很好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基礎。像台灣、南韓上世紀80年代後期推動的民主改革，相信是最理想的模式。平反「六四」就是這種改革清楚的訊號。

然而最近這幾年中國的政治氣氛不是寬鬆而是收緊了。與1988年的南韓漢城奧運相反，去年的北京奧運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機，而是領導層壓縮公民社會繼續發展的藉口。從收緊輿論包括網上輿論，打壓維權分子、非政府組織、各類異見分子等現象觀察，這種收緊在北京奧運前開始，北京奧運後未有結束。當然，這是因為2009年是「天安門事件」20周年，也是西藏動亂、達賴喇嘛出走的50周年，「五四運動」的90周年，開國大慶的60周年。

這種心態足以反映政權的虛弱；而這種虛弱，是因為不敢改革，不敢面對歷史。不斷找借口推遲改革，其實就是坐失改革的良機。到最後，經濟起飛階段完成，經濟增長開始放慢，市民對未來的期望不再樂觀，對領導層推動改革的信任和信心大打折扣，屆時中國領導層就算有心推動政改，不但事倍而功半，阻力就更大，步伐就更難控制。

趙紫陽的《改革歷程》一書，可能是對中華民族「六四事件」20周年紀念的最佳獻禮；中共宣傳機器的回應是重推《六四真相》。慶祝60周年軍警林立，北京列為一級保衛，沿用北京奧運期間的規格，這難道是反映「國之大治」？

十年前建國50大慶剛完，李慎之在10月10日公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建國60大慶前民間則流傳據說是萬里口述的《執政黨要建立基本的政治倫理——國慶六十周年前夕一位

老同志的談話》。過去十年黨內開明派「救亡圖存」的努力，收效不大，間接證明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就內地的政改，香港能起的作用有限。不過香港享有的言論自由，現階段尚能提供一個重要的討論平台。近年本港的統戰機器，在龐大資源的支持下，對本地輿論逐漸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相對而言，學術界與新聞界「自我制約」之風更盛。

本書作者就平日研究的基礎，為本書撰寫篇章，期望為「天安門事件」的見證盡一分力，為維護知識分子的風骨盡個人的責任。

第一部分「反思前路」首章由編者之一的鄭宇碩執筆。作者認為現階段在中國追求民主依然是一條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不管是自上而下由統治精英開創的民主改革，抑或是自下而上由群眾發動爭取民主運動，在可見的將來都不容易出現。一般國民基本上接受中國的現狀，因而不願意不惜犧牲去爭取政治改革。

目前內地的知識分子階層相當一部分是幹部、企業經理和專業人士，可說是既得利益階層。有論者判斷，要是再出現一次「天安門事件」，這些身處既得利益層的知識分子很可能會站到政府的一邊。1989年後，中國領導層就吸納各方面的精英進入既得利益階層，這顯然是成功的。

中國領導人吸取了「天安門事件」以及其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教訓。他們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有所提高；亦深明「政治秀」之道，溫家寶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最基本的問題是：一個權力精英集團，能否長期以經濟成長、社會保障網、吸納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等政治手段來維持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

丁偉一章旨在回顧過去20年關於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爭論，並試圖從中國政治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探討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路。丁偉認為中共中央黨校於2007年10月發表的政治改革倡議報告，揭示出政改的若干端倪；首要問題就是要界定中

共在急劇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角色。把黨權置於法權（人大）之下，或許就是現階段政改的突破點。

丁偉批評目前中國領導人抽象地肯定源自西方民主、法治、人權等價值觀的普世意義，但在實踐上則否定西方的做法。作者認為黨內民主與村委會選舉，不能作為政制民主化的起步；二者裝飾意味相當濃厚。若要實行基層民主，要鄉鎮政府以至更上一級縣政府由直接選舉產生，方能形成管治上的根本改變。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中國就不能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

在第三章洪清田解釋其樂觀預期的原因。雖然自「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的民主化表面上停滯不前，但中國社會實際上為中國民主化廣積實力。鎮壓「六四」民運以來20年的改革開放，促使內地經濟和外面世界接軌。這20年是中國民主化沒有目標的「拉布」，最終中國必會實現民主，而這正是中國秩序的重構。

洪氏批評中國政治只有權謀。近200年來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態度跳不出「以我為主」和「中體西用」的框架；迄今未及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對西方的開放、務實和理性的態度。

清末西潮下的救亡和啟蒙（改造）兩條路線之爭，其實就是集體專制權威暴政與個體自由民主法治之爭。毛澤東的新中國形成了完整的集體主義；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不過是「唯生產力、唯經濟、唯發展和唯穩定」之路。江澤民和胡錦濤亦未進入問題。洪清田期望中華民族總動員，從唯經濟的道路轉向「人」的民主化。

洪清田在第四章論述中國民主化的基礎在每一個中國人從「集體人」轉型做一個「個體人」。作者批評中國社會和文化視「個人主義」為精神鴉片；反而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形成完整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服務的多體制結構配套而成一個獨特的總體運作模式。洪清田嚴厲批判中國領導人把香港視為負累，沒有看到香港的真正價值。

雖然香港採取「拿來主義」，一味模仿；但洪清田認為百多年來香港文化基因的突變，是中國面向未來的知識寶庫。洪氏提倡把香港經驗的研究發展成一個知識體系，為探索中國文化轉型作出貢獻。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檢視「六四事件」對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民主發展所造成的互動影響。他首先探討「六四事件」對過去20年中港關係和香港民主發展的影響；繼而討論20年來香港支援中國民主工作對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作用；最後從組織發展和社會行動的角度研究「六四事件」對香港民間社會的意義。

如果沒有「六四事件」，蔡耀昌估計香港的民主發展將會緩步前進；而香港民主派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會較正常發展，但影響大局的力量仍然有限。

雖然在內地被視為「反動」甚或「顛覆」組織，支聯會仍然能夠在香港合法存在而且繼續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維持支聯會的旗幟作用，而香港一直成為中國土地上唯一可以合法、公開悼念「六四事件」的地方。「六四事件」同時也匯集了一大批堅定的爭取民主力量。

「反思前路」這一部分的作者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中國民主發展前景的樂觀取態，很多時不是具體地確定了近期民主發展的社會、政治趨勢，而是根據他們對人性的了解，對個人尊嚴的肯定。

劉銳紹寫本書第二部分「回顧」的第一章，旨在探索中國富強而開明的前路，尤其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作者的判斷是民智漸開，公民社會逐步形成；過去20年，老百姓不但在認識層面上了一個新台階，「軟抵抗」的行動也愈趨成熟。

根據劉銳紹的觀察，中國老百姓用行動勾勒出一個路線圖：先鞏固自己的經濟實力，然後再爭取公民權利，最後再爭取政治權益。作者謹慎地說明目前種種公民意識和政治意識不斷提高的

現象尚是零散的，未能形成大氣候，甚至有重新被壓倒的可能；但他抱着必須朝「從無到有」的發展角度看問題。

雖然劉銳紹認為「六四事件」已經到了解結的時候，但官方的信心和決心尚未足夠。他提議中國領導人先讓那些飄泊海外年老的異見人士回國；他謙稱這是「改良主義」階段論的一項建議。

林仁傑一章試圖回顧和省思北京「六四天安門學運」與台灣「野百合學運」，並比較這兩次學運對於後來兩岸社會的影響。作者認為「六四事件」是中共強烈拒絕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而近年中國的發展趨勢與美國所期待的和平演變大相逕庭，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不一定能導致政治改革的起步和自由民主的實現。

林仁傑認為兩岸這兩次學運都是在威權政治體制下表達自由民主的訴求；而均涉及領導層的鬥爭，因而變得更為混亂。「野百合學運」牽涉到所謂李登輝路線與非李登輝路線之爭。

林氏引述海外學者的看法，認為這兩次學運事件試圖將群眾隔離在學生抗議群之外的作法，是受到傳統儒家士大夫精神的影響。作者則認為這種做法反映了學運高貴的純潔性及其高度的出世性。

張嘉娟一章的重點在以文化變遷的角度去分析「八九民運」，並且將該歷史事件的要素：人、事、時與地作為文化符碼分別討論；作者把「八九民運」視為一種傅柯式的史學文本。由於80年代後視為「啟蒙時代」，在一定意義上意味着「五四時代」的重返，因此作者亦探索「八九民運」所呈現的啟蒙意涵。

張嘉娟認為「天安門一代」的學運領袖，一方面受到「新啟蒙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仍然帶着在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下成長的烙印，就想像與模仿西方的民主，意圖發起一場民主運動中，運動的內涵擺脫不了「文革」的影子。

「八九民運」期間，公共空間與公共對話均是重要的啟蒙指標。但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這樣的啟蒙基本話語，難以避

免地導致流血的結局。這與啟蒙風潮帶來存在主義，引發對「異化問題」思考和尋求「自我」是自相矛盾的。

周義澄以參與者的身分，為20年來海外中國政治流亡運動提供一個概要的敘述；文章集中討論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主中國陣綫和中國自由民主黨等組織。作者亦坦率地討論從本世紀初開始，流亡運動走向低潮和民運組織內鬥的情況。

劉賓雁痛言流亡組織內鬥的結果「驅使更多的中國人嫌惡政治，驅使越來越多的海外有志華人脫離民運，切斷民運的財源」。周義澄也指出幾乎所有內鬥都沒有涉及當事人政治路線或思想理念的重大分歧，主要是財務、人事安排和行為作風問題。幾乎所有被指控為貪污者都沒有在法律上被證實為犯罪並受到所在國的法律制裁，或者受到某個團體的行政懲罰，最後都不了了之。

周義澄希望透過新興力量的加入，海外流亡運動能進入可持續增長階段。作者認為流亡運動的主要功能為國際遊說團體、自由言論平台和組織力量基地。

本書第三部分是「回憶」，首章作者譚志強的主題是直接目擊與傳媒再現。譚氏認為從歷史考證的最低要求來看，所有個別人士「直接目擊」的追述，必須要與現在可以得到的其他人士的「直接目擊」追述，或中國官方披露較為可信的相關情節互相排列、比較、分析之後，才有可能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合併出較為真實的圖像。

譚志強認為香港取得「六四事件」的「話語權」和「詮釋權」的優勢，與本地新聞媒體和出版商無間斷地大量出版與「六四事件」有關著作有關。

中共政權沒有隨着東歐劇變、蘇聯崩潰解體，作者認為1992年鄧小平南巡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決定是關鍵。「六四事件」後不到三年，中國主流媒體完全退出了該事件「話語權」和「詮釋權」的戰場；而中共政權繼續有效統治的「認受性」，已經幾乎全部依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

黃偉國一章關注焦點是香港的中史教科書中的「六四事件」。它針對1997年後香港出版的中史教科書，根據它們對「六四事件」的論述作分析，探討「六四事件」如何被主觀描述，以及各類描述背後的脈絡和本質定向。作者希望探討教科書在富爭議性或政治敏感事件的論述對歷史教育產生的影響。

有學者提出，假如教科書提及「六四事件」只會對出版社做成不便，包括以政權的角度去分析事件只會使師生反感，繼而影響到政權透過教育過程建立和鞏固其政治文化主導權的優勢，較容易的做法是對事件絕口不提，或者以含糊以對的方式處理。

黃偉國的結果研究顯示教科書表面上對「六四事件」並無忌諱，但它們刻意迴避描繪事件的經過、責任和有關人物。這種情況反映本港歷史教育看似為政治服務的勢頭：對國家的正面成就要詳加講述，對領導人（特別是未去世者）要全盤肯定；反之對國家的黑暗面要輕輕帶過。

陳家樂和朱立一章討論香港電影中的「六四事件」。作者認為除了1967年的左派暴動外，「六四事件」及「九七回歸」是香港這50年來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時也觸發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移民問題。香港電影雖然商業掛帥，但關注這兩大政治事件的電影不少，一些更掀動人心。

在政治表述上，香港的主流商業電影與獨立電影存在着一定的差異，後者娛樂性稍欠，卻令觀眾反思，《沒有太陽的日子》是代表作。

針對「六四事件」的鎮壓，香港電影的借古諷今，顯示娛樂元素、批判及諷刺政治的結合，回應了時代的需要。商業電影並非完全是「虛假意識」或「純粹幻覺」，它們有其隱藏的政治表述。不過，作者認為香港電影的政治表述大部分是硬加進去的，反映過渡時期的香港電影頗有「後現代主義」色彩，帶有拼湊和混雜的風格，以及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狀態。

最後一章羅金義以「六四事件」為個案——一個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西方最為敏感、最難尋求妥協的議題，探究中國對西方媒體的感知和了解有什麼誤差。因為要研究西方的主流媒體，作者選擇了美國的《紐約時報》與英國的《泰晤士報》作為抽樣源。

作者的研究認為這兩大西方報章並沒有借助「八九北京學運」來從事「象徵鬥爭」。要說它們確是在爭取某種文化正當性，定義某種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那只能說是對血腥鎮壓的譴責和追究，以及為受害者追求正義。

羅金義認為「文化適應」不容易在西方對中國的感知上出現轉變；而中國社會對西方的文明價值有頗大的誤解。羅氏否定中國官方對「人權高於主權論」的批評，提出公平審訊權、獲知真相權、言論自由權和新聞自由權高於政權利益，而這些基本人權均是普世價值。

本書的出版，反映香港仍然是從事中國研究的理想地方，只要肯努力，種種「自我約制」的壓力還不致於成為不可克服的困難。文集的水平明顯尚待改進，然而大學教員為提升自身機構的國際排名，很多對母語寫作已經沒有什麼興趣。不少中學教師要求有多些「六四事件」的參考書，協助他們輔導同學了解這項重要的歷史事件，本書希望能幫上一點忙。

編者再一次感謝各位作者的耐心和貢獻；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社長鄺子器先生和陳家揚先生，為本書的面世盡了不少力，謹此致以深切謝意。本書尚嫌倉促，錯漏之處，自屬編者的責任，尚祈各方不吝指正。

鄭宇碩

2010年4月